

● 话外音

《跨文化对话》首发式暨对话会纪要

1998年10月22日

上海静安宾馆



《跨文化对话》首发式暨对话会会场

乐黛云(《跨文化对话》中方主编):

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主张文化的一元化,还是搞文化封闭都是行不通的。保持文化的多元,每种文化都以他种文化为参照,互为主观,重新认识自己,各种文化才能同存共荣。有一批欧洲和中国的学者八年来为了捍卫多元文化的发展,一直在



进行探讨。早在1991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就曾以“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为题,与中山大学合作,在中国召开了第一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6月,更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为题在北京大学召开;1996年6月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文化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讨论会。几次会议虽然都很成功,而且也都出了中、外文版论文集,但大家总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有一个园地,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这种想法在1997年5月召开于北大的、以“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为题的第四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更其明确地被提了出来。当年7月随即在巴黎近郊的维拉苏古堡召开了具体落实的会议,确定了《跨文化对话》、《远近丛书》、《关键词》三大项目的经费、学术委员会和具体撰写计划。今天,在许多朋友的支持下,《跨文化对话》终于有了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开始。今天请大家来,真诚地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批评和建议。

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南京大学举行过一次中法学者就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共存的问题进行研讨的会议,我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当时乐黛云教授从美国回来,一下飞机,就从北京再赶来南京参加讨论,她那个劲头是很让人感动的。西学东渐之后,都是以西学为坐标来研讨中国文化传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以西学为参照坐标的。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有以西方为坐标的倾向,也是西方化的。不同文化有没有共同标准的问题,这要研究。不能强调“同”,忘了“异”,强调“异”,忘了同。不能光是从思辨中解决问题,那是不行的。我是主张多元化的,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特殊性,个性,这是不容抹煞的。我想办这么一个刊物很有意义。

姜义华(复旦大学教授):

以前有人以西方为中心,现在又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

化的世纪。我想这是一种同样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妨碍着不同文化彼此平等相待,阻碍着异质文化的沟通与发展。《跨文化对话》强调文化的平等对话,这与上面的看法相比,前进了一大步,是很有意义的。我有个建议,希望做到真正的跨文化。现在只是中西文化对话,但其他文化也非常值得我们



注意。如印度文化正在成为强势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拉美文化,据说在拉美有一千多种语言,还有非洲大陆,我们的认识常是笼统一片。汤因比按地域将世界文明分成西方文明、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美洲本土文明等多种文明。若依照语系、语族来划分,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闪米特—含米特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南亚语系、安美印第安语系等不同语系,每一语系包含近十种或者更多语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系、不同语族的文化各有其特点。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会越来越重视那些非强势文化。我希望把跨文化对话事业再扩大一点,将亚、非、拉美各种语族的文化放到我们的视野之内,要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上各种文化,把这项事业作得更有影响。

朱维铮(复旦大学教授):

跨文化对话,对于异型的异质的各种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十分必要。从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倘说刊物应办成所谓全球性的,充其量只是未来的目标。目前学术界对于非洲、拉美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历史和现状,有多少了解呢?要是连那里的一般情形都说不清楚,便侈谈中国与其的文化交流,恐怕只好说是空话、大话,更勿论对话。因此我赞成乐黛云教授等办的《跨文化对话》的目前做法,就现有基础有可能对话的领域及课题开始,逐步朝未来目标走去,不要被不切实际的议论干扰。其实我们自以为已经相当熟悉的“西方文化”,概念本身便很模糊。“西方”本



是相对论性的界定。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在历史上依次指古印度、古东西罗马、近现代欧美乃至东瀛的日本。近现代欧美文化,便不能笼统说是西方文化。欧洲非英语民族,很多人竭力抗拒美国文化,就意味着他们并不认同美国文化可以等同于欧陆文化。中国史家强调近代两声“炮响”的意义,好说鸦片战争时英国炮舰将中国从中世纪打入近代,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将中国打入苏俄式的现代。然而我们批评“全盘西化”,却不把斯大林那一套视作西方某种文化的变种,这是很古怪的。近年还有人极力倡导“亚洲价值观”。将所谓儒教伦理说成亚洲价值的传统表征,至少有悖事实,而将所谓西方文化讲求自由与人权等等,说成违背亚洲传统价值而予以排斥,不过仍是晚清专制论者“中体西用”或日本维新后反文化改革论者“和魂洋才”的老调。中国人长期追求民主共和,但民国史证明革命换来的是假共和,这与否认人家的文化中间蕴含的有价值的东西,有没有关联呢?今年正值戊戌维新一百周年,纪念者自然有人,但看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整体回应,便令人感到特别寂寞,是不是因为有所忌讳呢?然而1898年那一百天,改革者们提出的必须改革的问题清单,在百年以来解决了几项?我看需要从历史上认真清理。明年又值“五四”八十周年,倘说它表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中国走上了新路,那末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似乎也有必要“研究研究”。在中外文化交往史的研究中,我完全不赞成欧洲中心论,同样完全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天朝至上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如要进行跨文化对话,了解对方和着重自我反思,才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我希望中国学者特别重视对异型的异质的文化真能做到同情的了解,力求从历史的角度多反省自身,真正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对话。

钱林森(《跨文化对话》执行主编):

《跨文化对话》是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读物,以丛书的形式不定期出版。丛书要编得有特色,有生气,就一定要关注现实生活,作为“跨文化对话”,就一定要关注世界上人类所共同面临和关心的问题,要把这些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发表出来。对专家学者来说,丛

书是一个交流、对话的园地;对广大读者来说,丛书是学习、认识和了解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一扇窗口。我们设想,丛书不仅是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通过对话,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一座桥梁,也应是学者与广大读者之间交流与沟通的一座桥梁。为此,丛书高品质的学术性与适合大众学习阅读的知识性的结合,自然成了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丛书是我们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的共同合作的项目,将用中文与法文在中国与法国出版,因此,它是双语出版物。

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

从事《跨文化对话》这项工作是有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的。今年从7月底到10月初在国外,对此也有一些感受。8月初出席了在波士顿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讨论了“文化会不会走向一体化”的问题。会上有位学者提出,现在讨论一体化为时过早,还是要多元化。既然是多元化,那么如何实现多元化,就需有人出来操作,谁来操作,就有一个权力介入的问题。

郝铭鉴(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上面是主编、顾问谈了“对话”的编辑宗旨,个别要提前离席的专家谈了对“对话”的初步印象。我想从出版者的角度,谈谈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出版即选择;正是这种选择,构成了一定的文化环境。不同的出版者有不同的选择眼光和选择标准。斯塔尔的报告,据说有人就很感兴趣。我们出版“对话”,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文化的责任感。出版者应有文化的良知,为民族、为社会的文化建设尽心尽责。这不仅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出版者的责任。中国要走向世界,和世界接轨,离开对世界文化的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通过对话这种形式,促使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共振”,有助于在“独角兽”和“龙”之



间构筑一座“文化桥梁”。二是对作者的信任。“对话”前年便开始酝酿，我们是在去年7月，在巴黎的维拉苏古堡里讨论“远近丛书”时，从乐黛云先生、汤一介先生和钱林森教授处了解到这一“工程”并决定全力介入的。当时有个强烈的印象：乐老师们不仅有学术眼光，和世界级的学者有着广泛的学术联系，而且对发展人类文化充满热忱，敏锐而又执着，我们相信和这样的作者合作是会卓有成效的。三是为了完整塑造出版社的形象，我们是文化出版社，但过去偏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出书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去年机构调整后，我们提出了“做文化人，出文化书”的口号，把出版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列入了计划。“对话”便是我们迈出的尝试的一步，希望能在今天的会上得到各位的指点。

郁白(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我十分感谢邀请我参加新闻发布会。我希望这项事业取得成功。现在有了第一本，希望能不断看到有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我想以往的出版物都是单一地介绍自己的文化，这很难进行真正的交流。应该有这样的紧迫感，要进行多元文化的交流。历史上是有过这种交流的。我们文化的来源，一定是多元化的来源，未来更要加强多元的交流。不要忘记了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历史上的交流，这促进了中国也促进了西方的发展。从二十一世纪来看，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应该有文化垄断。跨文化要全方位，不光是中西文化。要学习各种语言，包括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这是保证多元化的前提。

贾植芳(复旦大学教授):

各种文化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取长补短。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同文化的交流，也有过封闭的时期。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士、农、工、商，商是最不受重视的。现在留学生学成回国，许多人办工厂，经商，这是社会转型，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对出版社讲几句，不要做出版商、出版官，要出版



家，出版《跨文化对话》，有重要的文化上的意义。

谢遐龄(复旦大学教授):

《跨文化对话》是一件很好的事业，我举双手支持。我本人多年从事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研究，所以看到这本书感到十分亲切：今后有了一个合适的园地讨论本人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了。

我认为跨文化对话出于两大需要。一是中西文化在根本上不同，而二者交往日益频繁，怎样更好地来往和共处，是必须下一番功夫研究的，如人权问题，很有必要能够相互理解，这就需要对话；二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今日世界面临的问题不少是共同的难题，需要携手合作解决，这也需要对话。

中西文化之不同，突出点在西方文化中有强固的形而上学传统，而在中国文化传统全然没有形而上学（中国思想中讲形上问题，与 Metaphysics 完全不是一回事，二者区别在于有无逻辑主义原则）。所以西方主流文化是理性文化，而中国的主流文化不取理性主义态度。在中国思想中没有唯物主义，也没有唯心主义。但是中国引进了这些西方哲学术语，既用来讲学术，又用来指导生活，结果把思想和行为搞乱了不少。唯心这个词，本来是用来破执著法相的俗见的；执著法相大略相当于 Idealism，然而人们却把这个执著法相的 Idealism 翻译作唯心论——这不是把思想搞乱了么！亚里士多德的 Metaphysics 倾向于以形式为第一原因，但我们用“形而上者之谓道”翻译这个词，本来应该取“形”字，却取了“形而上”，岂不也是搞乱了思想？现在中国接触西方哲学已经有了百余年，应该加强对话，把双方思想中一些至今理解不太地道的概念澄清一些。这是十分必要的。

可能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神学目的论转变成以人为终极目的（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但是二十世纪终极目的终于被西方人丢弃了。现在美国社会还多少保留一点终极目的的概念，西欧社会终极目的的概念已经所剩无几了。中国社



会自五四运动以来,从西方思想中引进了中国思想中本来没有的终极目的概念,确立了理想主义的主导地位(理想主义必须以一个终极目的概念为前提)。现在中国人,至少是年轻的中国人基本上丢弃了终极目的概念(现在一些中国哲学家提倡终极关怀,乃是强调追寻安身立命之本,无涉终极目的概念)。这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特别年轻一代在科学主义左右之下、追求现代技术提供的种种物质便利,“看透了”何谓“人生”,对终极目的毫无兴趣。然而没有终极目的概念的群众能否安排出一个世界秩序似乎得不出积极的答案。所以东西方哲人的共同使命是一起探讨是否终极目的概念于人类必不可少,以及如果必不可少的话怎样确立起一个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诸民族都能接受的终极目的概念。无疑对话是必须的。毕竟生活是最为根本的。然而一则对话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一个方面;二则有对话才会有生活其他方面的改进。跨文化的对话有助于解决东西方面面对的共同问题,对话或许能够部分解决问题。或许收效甚微,终究必须进行下去,期待它能够产生一点效用。

我希望《跨文化对话》能够吸引较多的年轻人参与。未来属于青年,未来的问题依靠今日的青年解决,未来的前景由青年塑造。只有不断有年轻人参与进来,对话才能延续下去。人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看到《跨文化对话》我感到惊喜。不断听到新的刊物将创办,或者已经创办的消息。20年来,“对话”一直在进行,但是,按目前大学的知识体制,对话很难进行,只能在民间的知识体制内展开。现在的大学越并越大,这究竟好不好,是否有利于大学的发展还要再看。《跨文化对话》在上海出版有象征意义。上海这些年的建设有一流的硬件: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但是软件有问题,原创文化还处于较弱的态势,与一流的硬件配不上套。上海成了一个文化大码头,搭台让各



方来唱戏。目前在学术上“一南一北”很活跃,南是广州,北是北京。《跨文化对话》实际上也是北大、南大为主,只在上海出版而已。我没有来得及细读,只看了乐老师与舒衡哲的对话,感到这是一篇真正的对话,那种交流是深层次的,对话者各自背负着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当前在年轻的学者中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很热。他们喜欢研究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但太潮流的东西,未必可靠。这本杂志没有跟潮流走,这很好,应该有不同的声音,自己的声音。对话应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汤先生讲的“和而不同”。当代中国文化,成分已经很复杂了,要做到“和而不同”,首先要造成一种对话的氛围,善于倾听对方的声音。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跨文化对话》的出版,旨在引起人们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的重视和讨论。我认为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文化就是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中发展的,在古代,有先秦诸子百家的对话,以后有汉民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对话,还有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对话等等;在近代,中国新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当然,目前讨论跨文化对话,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全球化的趋势使人们在思考: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各民族的文化是否还有其发展的前景?我认为全球化不可能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它会使得各民族文化走向融合,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人类关注的问题是共同的,然而不同的文化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则是不一样的。这就有必要在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和对话。另外,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世俗化倾向,而且世俗文化层面的东西通过传媒,很快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因此,作为一个刊物,不仅要关注理论层面的跨文化对话,而且还要关注生活层面的跨文化对话。建议在这方面可以开辟专栏。

陈伯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西方中心主义解体以后,文化的走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对抗,一是对话。我们欢迎的是对话,这需要找到共同的话题。有些古老的论题,也可以开发,作为同西方对话的一项内容,比如传统哲学讲天人合一,西方讲主客两分,这方面如何对话。过去对“天人合一”批判较多,认其为不科学。近年来有所肯定,但也只是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类形而下的层面上展开,并未触及形而上的方面。而“天人合一”原本的精神应该是形而上的。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西方通行的主客两分的思维模式,固然有助于发扬人在实践和认知活动中的主体性,但有个根本的弱点,便是绕不过那个“物自体”。真要求得主客两方的统一,为人自身找到精神上的归属,看来还须借助于“天人合一”。如何从古老的命题中发掘出新的思维模式,以与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相比照、相沟通,这仍是值得关注的。当然再有一个方面,那就是世俗文化,我们也不可忽视。对话要有多种话语,要从各个民族自身出发。对话的目的不硬求同一,若能通过对话搞清相异之处,也是收获。

曹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这本《跨文化对话》与一般杂志期刊不太一样,它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的。这就需要对话文化有所了解,只有对异文化有所理解、然后才能对话。粗略翻看了一下,觉得栏目不够,有些栏目相互重叠。实际意思差不多。对话内容还是空泛了一点。我们现在好像处在南北朝时期,好像是在谈玄,有些就是谈玄的题目。对于文化对话,我们要做普及的工作;佛教在中国的流传,靠的就是各种形式的普及工作,变文的、讲经的、世俗小说的和图画等等。再过一年多就是二十一世纪了,新世纪是科技的世纪,也是对“异文化”加深理解、跨文化之间对话更加频繁的世纪。你们这个工

180



作非常有意义。跨文化对话应该是在不同层面的“对话”,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都需要。其实里面有许多有意义、有兴趣的话题,东西方的不同文化现象,有些还是有可比性的。比如当代的戴安娜王妃与古代的杨贵妃的比较,他们两人生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有相同的悲剧性的结局,她们俩人哪一个更痛苦呢?再比如克林顿总统与万历皇帝比较,哪个面临的问题更多些呢?再有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实在不敢恭维,尤其那个跨文化对话的“跨”字、不能用舒同体,太轻了。这些意见,可供进一步把杂志办好参考。

胡守钧(复旦大学教授):

《跨文化对话》的出版是做了件好事,学术品位高,品味定得好。这是高尚的孤独,需要有人不怕孤独,做这件事。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科技对文化的影响,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复杂的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要多研究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我本人就对书中两篇谈科技的文章特别感兴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展开来谈。看来编委会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黄巧灵(杭州宋城置业公司总裁):

参加今天的会,很兴奋,很激动,感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能来学习。我一直在商海中活动,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么多学者的讲话,这对我是个触动,对我这么一个从事经商的人提高文化很有帮助,希望今后有这样的机会不要忘了我。我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的的确是不同的。做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我很愿意参与探讨,并为此作我一点小小的贡献。

(记录整理:李国强)

